

聊齋

刻食刻虛入骨五分

寫鬼寫妖高人一等

廖苾光 著

聊齋《話聊》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聊 话 《聊 斋》

廖苾光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伟林

聊 话 《聊 斋》

廖蕊光 著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875印张 295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册

ISBN 7-5361-0007-8/I·1

统一书号：10343·16

定 价：3.15 元

目 录

话前的话	1
话一 幻想文学的源流	21
话二 幻想文学史上的奇花	44
话三 《聊斋志异》的基本情况	67
话四 《聊斋志异》的思想结构	80
话五 《聊斋志异》的艺术风格	100
话六 《聊斋志异》的艺术语言	128
话七 《聊斋志异》——真善美的统一	151
话八 谈狐	171
话九 说鬼神	236
话十 精灵怪异	303
话十一 几个奇特的女性	355
话后的话	396

话 前 的 话

——奇闻异事从何而来

《聊斋志异》一书，是记录奇闻异事的。记述奇闻异事的书，并不仅仅是一部《聊斋》。从《山海经》到《太平广记》从《夷坚志》到近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中间还有许多谈奇说怪之作。问题不在于谈怪异者之众，而在于世间奇闻异事竟如此之多。要了解《聊斋》之所以志异，有必要先探明那么多的奇闻异事，究从何来。其次，所以称为“聊话”，意思是：写作的目的，既不是对《聊斋志异》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也不是对全书各篇加以艺术品评，只是选择一些感兴趣的怪异故事，其内容有涉及世道人心、社会人生的，随意谈谈，想到写到，不求严格的形式结构，逻辑规律。因此，所话到的往往会越出《聊斋》之外，不过那些话也不一定是多余的。

话说天下之大，众生芸芸，异事奇闻，亘古以来，史不绝书。常言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这两句话里，就包涵着说不尽的奇闻异事。前者说的，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奇闻异事而言的；后者当然是指人间社会的怪异了。现在如果要说明那些奇闻异事究从何来，却也一言难尽。要是哲学家，就须先谈谈哲理，弄清事物的概念，本质等

等。譬如说：既然天地之间有许多奇闻异事，自然也就有正闻常事。有奇异，必然有正常，没有正常，就无所谓奇异。奇和正，异和常，是两个对立的矛盾概念。事物概念的每一差异，都是客观现实矛盾的反映。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存在着矛盾的，没有矛盾就不成其为世界。自然界，包括精神和社会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发展，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和斗争，矛盾斗争的过程和结果，难免出现不正常的奇异。翻开历史看看，不管是什么历史，它所记录的，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也就有这样那样的奇异。可以说，一切奇闻异事，都是从事物的矛盾和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既然如此，对于人来说，不同的时代社会，就有不同的矛盾，因而就有不同的奇闻异事。按摩尔根所划分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直至现在，在每一个时代里，都出现过无数的怪异之事。但这些千奇百怪的出现，并不都是坏人所作的坏事，因为世间的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既有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也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有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由矛盾所产生的怪异的性质也就不一样。

远在人类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即我们通常说的上古之世，人类的主要矛盾是人和自然的矛盾。^④《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所谓不胜禽兽虫蛇，就是毒蛇猛兽等威胁了人类的生存，这是当时人和自然之间的主要矛盾。此外，雷鸣电闪的天象变异，烈日酷暑与冰雪严寒的气候变化，狂风暴雨的侵袭与洪水的泛滥，这些在当时也是对人类的威胁，是人类共同遭受的难以抗拒和难于理解的人对自然的矛盾。马克思主

义认为：那时，自然对于人来说，是作为完全外在的，万能的和不可接近的力量而同人们对立着，人们完全动物式地对待自然，他们象牲畜一样服从自然的权力；因此，对于自然是纯粹动物的意识。这种人和自然的完全对立，人对自然力的无法控制，对自然现象的惊异，就产生了幻想。幻想有两个方面，一是对那些不可抗拒的威胁着人类的自然现象，以为一定有个主宰在那里操纵着自然，与人作对而主宰着人的祸福。这种主宰者，后来便被名为上帝，或总称之为神。这就是把自然神化，是产生宗教意识的开始。另一方面的幻想是，由于当时的人既不理解自然现象，又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就幻想出敢于和自然力作斗争的异常的人，这就把人神化，也就是产生神话故事的开端。神话是最早的奇闻异事。可以说，人间流传的奇闻异事就是从原始神话开始的。

最早的神话中所流传下来的奇闻异事，是属于摩尔根所说的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即阶级出现以前原始社会时代的奇闻异事。那时候，正如前面所说的，人的主要矛盾，是人和自然的矛盾，流传下来的神话，也多是对自然界的斗争和自然现象的探究之类的奇闻异事。如：

《夸父逐日》：“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是对自然现象不能理解，太阳每天从这一边出来，向那一边落下去，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得而知。为了弄清它的原因，掌握它的规律，便跟着太阳跑，直至自我牺牲为止。这充分反映了探索自然现象，穷究自然规律的斗争精神。

《后羿射日》：“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猋𪔐，凿齿、九婴、大风、封豕、修蛇，

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豕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这是反映对自然界的斗争：烈日的干旱，毒蛇猛兽的祸害，都是当时对人类的极大威胁。而能善于用人，为民除害的尧，便被选为天子。这也反映出原始的自发的民主精神幼芽。

《女娲补天》：“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熋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这也是反映对自然威胁所进行的斗争，而在那个时候，对自然的斗争，是不分男女，各尽其力的。人类一开始，男女就是平等的。

象这类的神话，虽然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只零星散见于如《山海经》《淮南子》一类的书中，但即此已足以窥见原始社会时期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性质。这种神话，没有反映出私人的生活关系和个人的利益，而是反映一切都为集体的利益，为解决人类的共同遭遇和矛盾而斗争。有关自然现象的神话，还没有同个人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没有涂上迷信的色彩和阶级的印记。它只是用想象以征服自然，把人对自然力的斗争形象化。这类神话中的人物故事，虽然还是一种幻想，但已不是纯粹抽象的概念，而是如黑格尔所说的“神话采取了化身的形式或个体化的形式”，把当时杰出的劳动人民化成英雄的形象。

当然，这样的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也不能看作百分之百的真实。屈原在他的《天问》的一开头就提出了疑问，说：“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

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意思是：远古时代的事，是谁传说下来的？天地还没有形成，是从哪里去考察的？日月昼夜清浊晦明，是谁能够穷究它的原因的？宇宙间无限的无形迹象，怎样才能认识它呢？这些都是大问题，它就包括了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问题。在《天问》的后面，屈原也提到太阳“出自暘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也提到射日的故事，说：“羿焉弹日，鸟焉解羽？”可见屈原那个时候，还广泛流传这类神话，但它是怎样流传下来？屈原就首先提出这个问题。

唐朝的柳宗元，针对屈原的《天问》作了一篇《天对》，对屈原提出的每一问题，都做了对答。对于每一个问题对答得好不好，姑不具论，这里只谈开头一个问题的对答。

对于“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柳宗元对：“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对于“上下未形……”等三个问题，柳宗元的对答是“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柳宗元所对答的意思就是：原始渺茫之世的那些奇闻异事，是那些荒诞的人传讲下来的。神灵开天辟地等所做的事那样隐晦纷繁，怎么可以讲得清楚呢？

柳宗元说：“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当然，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如上面所举夸父逐日一类的例子，在今天乃至柳宗元那个时代看来，自然是荒诞不经之谈，但是在古代创造或传讲这些故事的人，那就不一定是诞者——荒诞的人。这是一个时代的人对自然界、人类、事物的认识问题。不管那些传说怎样奇异荒诞，它正好说明了它的时代特征，不能说是传说的人荒诞无知。就是说，传说的故事，后人看来是荒诞的，但当时传说的人，并不是荒诞的。而且正是在今天看来，谁都不会相信的那些荒唐的谬说，史前时期的高

悬空际的无稽之谈，后来却不少为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逐渐在思想领域如宗教、哲学乃至科学等方面，产生源远流长的影响。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一封信里，在谈到原始谬论对宗教、哲学的关系之后说：“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步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页）不仅如此，列宁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也提醒人们注意：“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而今天呢，同样还是那种联系，只是科学和神话间的比例却不同了。（列宁：《哲学笔记》第253页。）这都说明，遂古之初，由诞者传下来的许多荒诞的奇闻异事，既是荒谬的，也是天真的，真实的。恩格斯、列宁他们非常深刻地指出了对于原始神话故事的深远意义的认识，理解到幻想的奇闻异事向现实的奇闻异事辩证发展的无穷规律。我们试看：从夸父逐日到发现太阳中心；从后羿射日到发射火箭；从女娲补天到星际飞行；还有许多荒诞而美丽的奇闻异事，如嫦娥奔月，现在却是真人登上了月球；抟土造人，现在却有机器人的制造；千里眼，顺风耳的奇闻，现在却有侦察卫星与电子通讯。还有许多由荒诞的幻想演化成为科学的。这就是幻想的奇闻异事，向科学的奇闻异事的发展和转化，从原始的幻想，向高度的科学演进。这种演进所取得的巨大的科学成就，它不属于某个人，某个阶级，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所专有。这种日新月异的科学成就，是整个人类智慧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的不断积累和飞跃，是人类才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来的各种异彩奇花。这种异彩奇花，是全人类的共同业绩。正如我们的祖先之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等等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

以上所说的科学上令人惊奇的成就，是史前时代所无法想象的。从幻想的奇闻异事，到科学的奇闻异事，是经过绵长的岁月，无数次消除谬论或更新谬论才达到的，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才一步一步前进的。因此，我们并不是要求远在唐朝的柳宗元要懂得这个道理，只是希望说明，要以辩证的观点，对待真理和谬误；幻想的奇闻异事，往往是科学的奇闻异事的起点。幻想的矛盾，是与现实的矛盾不断向上地互相转化。而幻想的奇闻异事，又正是现实事物的反映。在《聊斋志异》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神话是虚构的、幻想的，而社会人的活动却是真实的、现实的。不过由于私有制的出现，带来了人对财富的贪欲，它已成为文明时代的一种社会动力。但这个财富，并不是公有的而是私人的。那些为劫夺财富，争夺权力而拼命的人，已养成狡诈、狠毒的个性，具有了极端阴险的政治骗子和经济骗子的手段。人与人之间，造成了尔虞我诈的虚伪关系。这时的社会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奇闻异事，已不是幻想的而是十足现实的了。

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曾引用歌德的《瑞士来信》里维特写的一段话：

“奇闻异事？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愚蠢的字眼？……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虚伪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奇闻异事，这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

恩格斯认为，上面所引的那些话，也还不是对社会的一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只是“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对横跨在

市民的现实和自己对这个现实所抱的同样是市民的幻想之间的鸿沟所发出的这种绝望的哀号，这些完全是由于缺乏起码的经验而发出的悲叹。”的确，从上面所引的那些话看来，它并没有显示出“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只吐露出对于社会现实的无可奈何的不满，表现出对于生活的愤愤不平，对虚伪的人间社会表示深恶痛绝而已。他的愤懑的语言，并没有显示出对丑恶的社会进行战斗的抨击，表露出革命的锋芒，没有接触到社会问题的本质。只对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矛盾发出哀号。虽然如此，维特所悲叹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虚伪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奇闻异事，这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对于阶级社会说来，却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就是有那么一种人，是那樣的虚伪对人，表面上讲仁讲义，满脸君子；背地里拳打脚踢，十足小人。阴的一套，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例如工厂主对工人说：你们是靠我们养活的，我给了你们工资。说的好听，却掩藏了他的剥削。

这些奇闻异事，所以说的是真正的，因为它既不是幻想的，也不是虚妄的，而是非常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奇闻异事。

为什么到了文明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如此虚伪，会成为奇闻异事，会出现令人惊异的事情呢？其根源就在于社会上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我们知道，进入文明时代，已经有明显的社会分工，生产率提高，增加了财富，使生产范围扩大的同时，在已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奴隶制；奴隶制是古代世界必然地出现的第一个剥削形式。这种奴隶制，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

阶级，人类开始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时期，直到现在。这是马克思主义明白地告诉我们的。

文明时代开始，社会性质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生产的发展，文化知识也日益提高，这正是恩格斯说的“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有了文字，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带进来的宝贵遗产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这时才有可能用文字记录下来。但这时候记录下来的东西，有的记录得比较真实，保存原来的风貌。如夸父逐日一类故事就是。但有的却受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影响，对于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进行篡改或创新，标上了新的时代标志。例如：关于创造人的故事就是。在《太平御览》卷78所引《风俗通义》里的一条：“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矣智，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絙人也。”这虽然同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奇闻异事，但和前面所引的《夸父逐日》之类的奇闻异事就有根本不同之处了。从这个神话故事里可以看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富人（剥削者）和穷人（被剥削者），贵者（统治者）和贱者（被统治者）。可以肯定，这不是原始社会时代的社会现实，而是属于文明时代的社会情况。到了文明时代，它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人与人之间贫和富的矛盾。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把文明时代叫做“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富人和穷人的出现，就是文明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而这种贫富矛盾的产生，如果按照抟土为人的神话来解释，那是由于创造人类时就已经分别创造定了的，人间一定有贫有富，是不能改变的。

其次，这个神话，除了从财产上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之

外，又从身分上把人分为贵人和贱人，即处于统治地位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等等的“劳心者”和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奴隶等等的“劳力者”。这也是造人的时候注定了的，不能改变的。

第三，这个神话，还从人的才智方面，区分为智者和庸人，即一种是所谓“上智”，是生而知之的天聪天明的人；一种是所谓“下愚”，是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群氓。这也是造人的时候定下来的，不可改变的。

这个抟土造人的神话，决定了人的贫富、贵贱、贤愚的不可改变的命运，为宿命论奠下了基础。傅立叶的富人对穷人的战争的理论，道破了文明社会战争的性质，肯定了在这样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维特所愤懑不平的人与人间的虚伪关系，真正的奇闻异事和令人惊奇的事情的必然出现。这种人间妖异的出现，绝不是神话传说的幻想。也不是宗教迷信的虚妄，而是千真万确的人间事实。这样的奇闻异事是很多的，例如：

据说殷纣王为酒池、肉林、糟丘，令男女奴隶，裸身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又以绳牵人头谄池，醉溺而死，以为戏乐。这是人类刚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就出现的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情。再举《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得二虜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虜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虜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这两个被称为妖异的奇闻异事，都是人间可惊奇的事情，特别是后者，明显地指出：自然现象的怪异，是不算什么的，只有人间的怪异才是可怕的。“君令不行”，就是中央

的命令贯彻不下去，所以是“妖之大者”！荀子特别强调人妖的可怕，他在《天论》里说：“星之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荀子认为，从已出现的事物看来，只有人妖是可怕的。什么是人妖？荀子以为：不精耕细作，伤害禾稼，农作歉收，苛政失民，田地荒芜，米贵民饥，路有死人，这就叫人妖；政令不明，不及时兴革，不尽忠职守，这就是人妖；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这就是人妖。他还引古人的话说：“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至于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那是要天天切磋而不能放弃的。凡是经济、政治和家庭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都是人妖。

看来，远在春秋战国时候，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严重性了。

被尊为儒家之祖的孔子，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有过认真的研究，因为他已经看到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人间的虚伪的关系，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他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曾想出一套消除人间怪异的办法。

孔子把人间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儒家称为五伦。认为只要这五种关系搞得好，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人妖，不会有令人惊奇的事。

这五种关系可分为三类：君臣关系，这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臣也指臣民，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臣。父子、兄弟、夫妇，这是家庭关系。朋友，是社会的 关系。据《论语·颜渊》，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对于孔子这个回答，极为赞赏，说：“好极了！如果真的为君的 不成其为君，为臣的不

成其为臣，为父的不成其为父，为子的不成其为子，虽有粮食，我能吃到它吗？”意思就是，如果君臣父子不能各循其道，各守其分，势必天下大乱，令人惊奇的人间怪异就会出现。所以事父事君是孔子处理五伦关系的核心。他在谈论学《诗》的重要性时，即提到学《诗》对于事父事君的作用。

孔子提出了五种人间关系，也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办法，即仁、义、礼、智、信，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五常。五常之中，仁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孔子曾在多方面解释仁，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与弟是人之本。即是说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基础关系。仁在一般的社会关系中，也是普遍适用的，所以说：“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仁是对于各种人间关系都必要的。仁的内涵有多种表现。当子张问仁于孔子的时候，孔子就概括地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仁义礼智信五者，既有内在的相互作用，也有外在的互相联系。如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信近于义，恭近于礼。’”在实践上，提出“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对于义，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见义不为无勇也。”对于智，反对不知而作之”。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知”。为了搞好五伦关系，还提出许多与五常相辅相成的实践之道，如忠和孝。如提倡中庸之道，凡事不为己甚。还有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君子无所争”。在政治上，“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在对待贫富问题上，主张“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认为君子应当安于贫穷。所以表扬颜回生活穷困而不改其乐。

孔子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大类，实质上就是富贵的与贫贱的两种人。而富贵与贫贱正是社会中主要的矛盾所在。孔子对于消除人间社会的矛盾，是煞费苦心的。但是，争夺财富与权力，就是产生人间怪异的根源。这一点，孔子是还理解不到的。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是什么？朱熹说：“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西汉京房对元帝说：“《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所谓乱贼，灾异，还不是弑父弑君一类的人伦之变的怪异？所以不论是《春秋》还是纲常人伦之道，都是为了解决人间关系中的矛盾而制作出来的。

孔子提出的些这伦常之教，虽然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人与人间的道德准则，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但由于它没有触及社会的实质问题，所以对于消除人间怪异的出现，却并不奏效。

紧接着亡秦而统一中国的汉朝，虽然号称尊孔，而且汉高祖还到过曲阜祭过孔子，但是首先破坏孔子纲常之教的，正是汉家朝廷。刘邦做了皇帝之后，时时都疑忌自己左右的人造反夺权，因而大肆屠杀功臣。如身经百战，为刘邦建立功业的韩信，彭越、黥布等皆被阴谋杀害，甚至彭越被杀后，还将其尸体剁成肉酱，以赐诸侯，表面上请吃人肉，实际上是斩狗教猴，进行威吓。可谓凶残至极！司马光在评论赵王敖、贯高谋反事件时说：“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其实刘邦称帝之后，唯一害怕的便是被篡位夺权，而可能进行篡夺的，便被认为是功臣近臣，因此对亲近之臣不亲不信，常怀妒忌，与吕后狼狈为恶，对所疑者阴谋迫害残杀；